

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国家建构的话语省思

郭忠华

“百年大变局”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讨论话题，“百年大变局”所带来的影响折射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对中国国家建构提出的新挑战。显然，要省思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国家建构话语，首先依赖于对两个问题的澄清：一是何谓“百年大变局”，二是何谓“国家建构”。

一、何种变局？何种建构？

关于“百年大变局”，近年来学术界的探讨明显增多。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科学汇思”为题，专门设立了一个专栏讨论，学者对于“百年大变局”的含义进行了探讨。任剑涛教授认为，“百年未有之变局”指的是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重叠，自然时间表明了过去一百年的时间段落，社会时间上则点明了“大变局”的一百年，是社会时间赋予了自然时间以特殊的意义。^①郭台辉教授从大致相同的角度出发，认为“百年变局”是“时-空意识”与“人-事意识”等双重意识的叠加，体现了时间意识之“变”与空间意识之“局”的统一。^②邓曦泽教授从知识生产、劳动形态、个体生存环境、全球治理等角度试图回答“大变局”时代到底“变”在哪里。^③总结部分现有讨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部分学者对于当今时代具有明确的“变局”感知，但对于“变局”之理解莫衷一是。

对于“百年大变局”的不同理解反映了大变局时代的多副面孔。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变局”具象也就不同。但无论如何理解，“百年”的时间幅度是确定的，需要探讨的是在从20世纪第三个十年至今的一百年里，社会到底发生了何种巨变。“局”表明支撑一个时代的“结构性原则”，“变”则是结构性原则的改变和新时代的诞生。以回溯的眼光追忆中国现代历史，1921年发生的对此后历史最具有开端性的事件莫过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有了一种迥异于此前的社会建构思想——马克思主义。但新事物的成长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说，1921年之后中国社会就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相反，从此后到1949年，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支配性力量的存在，中国社会主要还是体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只有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造运动的开展，社会的结构性原则才发生根本性改变，呈现出一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风貌。改革开放的启动带来了社会结构性原则的再一次变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多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发展，使社会主义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但晚近的一系列变化表明，变局正

① 任剑涛：《社会变迁的时间尺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 郭台辉：《“百年变局”再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 邓曦泽：《我们空间处身什么样的大变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再次发生，承载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原则再一次发生巨大转型，其中的重要变化包括：国际背景下的全球化、中国崛起和民族国家的撞击，生产方式上的全球产业分工和后工业化，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从“匮乏型社会”向“温饱型社会”再向“富裕型社会”的过渡，以及社会生存方式上的“次生口语时代”的来临等。“百年大变局”不是单线和单次的变局，而是复线和复合的变局。新的大变局时代的来临，给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但是，与对“百年大变局”的理解一样，学术界有关“国家建构”的理解也歧见纷呈。但总体而言，都把国家建构等同于现代国家建构。在这一方面，福山将“现代国家建构”分割为“政权建构”（state-building）、“法治”（rule of law）和“责任政府”（accountability）三个阶段，认为只有三个阶段都全部完成了的国家才称得上是现代国家。^① 迈克尔·曼从基础权力与专制权力的模型出发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并对两种权力在现代国家的结合模式进行了阐述。^② 查尔斯·蒂利以“强制-资本”作为分析框架，考察这两种因素在形成不同类型的欧洲民族国家上发挥的作用。^③ 但大部分学者还是从单一角度来分析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比如：安东尼·吉登斯站在军事暴力的角度来分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演进方式以及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④ 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从产权结构和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考察现代西方世界的兴起；^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等。^⑥

上述有关现代国家建构的观点之所以差异迥然，关键在于学者在分析现代国家时依据的标准存在差异，其中既有单一的标准，也有复合的标准。我们很难断定哪一种标准更加正确抑或更加重要，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这些标准都是国家建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借以分析现代国家的形成？对于这一问题，韦伯等人早已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韦伯专门谈到如何研究国家的问题，在他看来，要对国家进行分析，关键不是首先建立起某种“普遍性概念”，因为现实中的国家总是无比复杂，很难对其做出统一的概括。相反，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起有关国家的“理想类型”，再根据这一类型来比照和衡量现实中的国家。那么，什么是国家的理想类型呢？那就是将国家的典型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加以极端化，形成一种“纯粹”意义的国家图像。^⑦ 安德鲁·海伍德也认为，“在现实中民族国家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纯粹的民族国家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从未出现过”^⑧。

在抽象现代国家的典型要素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尝试。比如，曼建立的 IEMP 模型，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现代国家必须具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种类型的权力——尽管现实中的国家在这些权力上可能各有短长。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界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成为现代国家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 页。

② [英]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976—1914）》上，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8—71 页。

③ [美]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22 页。

④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Chapter 1.

⑤ [美] 道格拉斯·诺思、[美] 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2 页。

⑥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6—58 页。

⑦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55—61 页。

⑧ [美]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4 页。

必须具备的内外条件：“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它是一种治理的制度模式，在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内实施管理垄断，其治理依赖于法律和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垄断。”^① 克里斯多夫·皮尔逊则鲜明地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九个方面：（垄断）暴力手段的支配、领土权、主权、合宪权、非个体权力、公共官僚、权力/合法性、公民权和税收。^② 可见，由众多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公民身份、民族共同体、宪法之治、暴力垄断、官僚制行政、领土权、主权、税收等都属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一要素链还是开放性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发展，还可以有更多的要素加入其中。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类型”不可能是一个短暂和一次性完成的过程，而只能是一个开放和持久的过程。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群像

在明确了百年变局和国家建构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基本含义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中国国家建构话语做出总结，从而对中国现代国家的研究状况形成总体判断。概括起来，这一话题的核心进路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从“政权建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福山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在将现代国家建构区分为政权建构、法治和责任政府三个阶段以后，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汉时期便完成了第一个阶段，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卓有成效的政权的国家，但此后的历史一直徘徊不前，最终被英、法等西方国家赶上，西方国家率先完成法治和责任政府的建构步骤。^③ 言下之意，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尽管开始甚早，但迄今仍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全部过程。福山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华人学术圈，同样有不少学者从“政权建构”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国家。比如，赵鼎新从“儒法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认为自西汉开始，中国便逐步形成了一种“外儒内法”的政权模式，即以儒学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又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④ 儒法国家尽管不能等同于现代国家，却为现代国家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范本。除此之外，从“政党”角度来理解政权建设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此类观点主要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因为中国近代是一种殖民地背景，历史证明，只有借助于高度组织化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将分散的国家建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来推进现代政权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国家的建构。^⑤

从“民族建构”角度来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比如，葛兆光认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宋代，因为在那时，宋与金、辽之间已形成了明确的边界划分，天下缩小成中国、原来的四夷则变成敌手，宋辽之间已出现对等的外交，及至宋元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群体已出现了明确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⑥ 但是，葛兆光所说的“民族国家”主要指以“汉族”为基础的单一民族国家，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121.

② [英] 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论现代国家》（第三版），刘国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页。

③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144—145页。

④ [美]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⑥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62页。

与当代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学者从“中华民族”建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探讨中国如何从传统以“华夷之辨”为基础的“原初族群型国家”转变为各民族取长补短、相济发展的“疆域型国家”。在这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兴盛于美国的所谓“新清史”研究提出过某些重要的观点。“新清史”涉及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但满洲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其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例如，在“新清史”研究者看来，清朝鼎盛时期是一个与传统中原王朝迥异的帝国，它建立起了一个包括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广袤地区在内的“内亚帝国”，从而超越了传统中原王朝的华夏中心主义而塑造出了一个包括满汉蒙回藏等主要民族在内的大民族结构。这种民族结构不再是以汉族为中心扩展开来的睥睨性民族结构，而是各民族取长补短、相济为用的平等结构。言下之意，是清朝统治者最早缔造出多元平等的民族结构，它为后来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等观念出台奠定了基础。“新清史”代表的毕竟只是一个研究流派的观点，且有抹杀清朝民族矛盾和民族实际不平等的嫌疑，以及被指认有“潜在的民族分裂倾向”。^①正因为如此，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从各民族历史交往与融合的长周期视角来考察中华民族建构的问题。

从“税收”“预算”等经济视角来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传统国家主要建立在地租、田赋的基础上，被称作“自产国家”或“租金国家”。现代国家则建立在税收的基础上。因此，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变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兴起。在西方理论界，税收国家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但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如何解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建立起税收国家，成为一个在学理上必须首先突破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税收国家并不是私有制的专利，实际上，税收国家的真正基础是市场经济而非所有制结构。^②这一理论突破为中国税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税收国家的视角，部分学者考察了税收与纳税人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税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等，认为如果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高，中国向“税收国家”的转型就可能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性就将越高。但他们总体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财政结构仍然是混合型的，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的特征仍很明显，因此，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仍然非常高。与“税收国家”相关，王绍光等学者从“预算”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国家转型，认为现代国家都具有以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为基础的财政预算制度，以1999年开始试编部门预算改革为标志，中国开始向“预算国家”转型。^③

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角度来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在这一方面，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相关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秉承“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立场，孔飞力高度重视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的“盛世危机”对中国现代转型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一段时间是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针对这一时期，孔飞力重点分析了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地方叛乱对清政府军事结构的影响，以绅士为主导的地方军事化的发展，既在短时间内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但也标志着传统国家崩溃的开始和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④同样的

① 梁展：《族群转向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3日。

② 张富强：《论税收国家的基础》，《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③ 王绍光：《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读书》2007年第10期。

④ 参阅[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问题也反映在知识分子群体上。通过考察晚清时期魏源、冯桂芬以及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人物的思想，孔飞力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问题，包括政治参与的扩展、国家合法性的转型、政治竞争的展开、公共利益的维护、国家财政汲取与地方财政需要之间的平衡等问题。^①除上述要素外，比如，还有学者从大众消费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现代国家的创建。那就是，“消费”隐含着深刻的政治意涵，纵览整个20世纪，中国不断从“民族性”角度来界定物质文明，试图把消费民族化，给发型、服饰和重要商品强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视觉想象，同时不断发动抵制外来货物的运动。随着此类运动的持续开展和不断扩大，中外之间的界限不断变得明确，“民族的”想象变得越来越清晰，并且得到了当时政权的支持和强化。^②从总体而言，本视角主要从中国社会内部来寻找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

从地缘和国际关系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传统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是一种“天下”秩序。以中原为基础的华夏被看作“天下”的中心，周围则被“四夷”所环绕。“中原”是天下文明的中心，“四夷”则被看作野蛮和不开化的表征。当然，“夷”“夏”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始终清楚，相反，它们之间时常进行着动态调整，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清之后，西人东来，夷狄亦被进一步用来指深目高鼻的西人，其中亦含有轻贬之意。18世纪末期的马夏尔尼使华和19世纪上半期的阿美士德使华都表明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西方现代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差异。那么，中国是如何从一个至大无外的天下体系转向为万国体系的成员的？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鸦片战争之后《万国公法》等国际法的翻译、《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总理衙门的设立等事件来考察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在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数屈文生教授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该书对1858—1880年晚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的行为和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探讨了当时中国从传统天下观念向万国成员观念转变的过程和方式。除此之外，方维规等学者还从概念史角度出发，探讨“夷”字在19世纪中后期被“洋”“外”“西”等词汇取代的过程，探讨词汇嬗变的原则以及后面所折射出来的晚清政府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观”。^③

前文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梳理尽管无法穷尽所有研究成果，但至少反映了当前有关这一主题的主要研究进路。政权建构、民族建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国际关系五个维度的现代国家转型，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所必须完成的环节。由于选择的视角不同，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时间和内容也就相应出现差异，这正是当前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之所以歧义纷呈的原因。如果说上述梳理反映的仅仅是中国过往现代国家建构已经走过的轨迹，那么，随着新的“百年大变局”时代的来临，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相应面临着新的课题。

三、百年大变局对国家建构的新要求

如前所述，现代国家建构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过程，而是可能遍及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阶段完成不同的要素建构。甚至同一个要素，时代变迁也可能提出新的建构要求。

^① 参阅[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导论。

^② 参阅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参阅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一章。

尽管福山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个完成现代政权建构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完成，只是法治和责任政府这两个步骤被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其实，且不说福山的观点后面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即使从第一个步骤来看，福山的观点也未必能站得住脚。中国在秦汉时期的确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但不同的时代对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即使同样是中央集权要素，也需要基于不同的时代要求而持续建构。从这一角度而言，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现代国家建构都永远在路上。那么，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给国家建构提出了哪些新的话题？我把它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应对复杂国际局势能力的建构。当今时代的局势不仅非传统国家可比拟，就是典型的民族国家时代也无可比拟。传统时代尽管存在着国家之间偶然甚至比较频繁的交往，但远没有形成现代国际关系。对于中国而言，传统时代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时代，与现代国家的要求格格不入。在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如哈贝马斯所言，传统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在同一个国家的疆界范围内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的格局，民族国家政府对于自身领土边界范围内的事务具有垄断性的行政管理权。但自20世纪晚期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传统民族国家的格局已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已溢出固定的领土边界而在全球范围内支流四溢，跨国公司是这个方面的主要推手，民族国家对于自身经济的管控能力已大大下降，一个国家发生的经济问题很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连带性影响。但另一方面，面对外来力量的狂浪冲击，民族国家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主权的独立性，世界似乎真正进入一个典型而纯粹的民族国家时代。在这种条件下，民族国家变得对全球性力量来说太小而无法独自面对，但对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来说又变得太大以至于显得笨拙。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是完全利他的和大公无私的，在全球舞台上，民族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而不乏恶性竞争。这一点从近年来美国的频繁“退群”和对中国发动的“卡脖子”事件中便可见一斑。全球化既可以给民族国家带来好处，也可以给民族国家造成损失。从近十余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问题中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全球化的严重逆反。国际形势正进入一个以民族国家政府为代表和以跨国公司等全球性力量为代表的双重角力阶段，这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波谲云诡的阶段。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开始变得更加不确定。这便对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政府能提升对各种国际性和全球性冲击的预测能力，而且还要求能灵活做出反应，提升应对能力。从更加有利的角度出发，还要求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切中肯綮，使自身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其二，与前一个问题相关，国际引领能力的建构。回溯历史，传统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较强的引领能力，但彼时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交流总体上非常有限，同时周边小国也很难形成与中国竞争的格局，从而导致传统中国自成一体的“天下体系”。在近代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天下体系很快土崩瓦解，中国被迫转入西方的现代性轨道，沿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所开辟的道路前行。这一点体现在近代知识分子基于西方蓝本所设计的发展蓝图上。其时，中国不仅不是国际事务的引领者，而且还变成西方现代性精神和制度的学习者和模仿者。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晚期，中国的国家发展策略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赶超”上。然而，经过近代的屈辱经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中国正逐渐摆脱原来学习者和效仿者的角色而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导致国际角色的转变，同时要求中国具有相应的国际引领能力。一方面，当今时代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时代，各民族国家

都具有各自的核心利益。但另一方面,当今时代各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彼此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民族国家面临着诸多共同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等。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不是把自身利益置于最高境地,甚至不惜以邻为壑,就如过去几年美国所做的那样,而是能够将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大国是国际政治和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只有能真正推动人类整体发展的大国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国,才能得道多助和赢得国际认同。从这一角度而言,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不断崛起,中国的世界引领能力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如何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何积极介入地区性事务,赢得当事方的信任和尊重,推动地区性问题的解决;如何开启国际发展的新格局,并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和追随。

其三,重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能力。任何国家都必须以相应的社会作为基础,但传统时期的政权建构理念未必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英国著名学者沃尔特·翁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原生口语时代、文字印刷时代和次生口语时代,并认为,当今社会已进入次生口语时代。次生口语时代不是简单地回归到原生口语时代,而是结合了文字印刷时代的许多特征。比如,原生口语时代的社会互动具有在场性、即时性、心声同步性的特征。相对而言,文字印刷则使言说者的心声具有了诸多后台修饰的机会,使言说者的思想可以跨越广袤的时空而与不在场的受众形成心灵交流。次生口语时代结合前两个时代的特性,比如在各种形式的电子交流中,夹杂着俚语、符号等的口语形式成为主要的交流载体,但它又并不是完全回归到原生口语时代,因为文字的简洁、版面的精美等仍然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在交流方式上,次生口语时代既可以面对面互动,也可以通过留言、视频等方式进行虚拟在场的互动;在互动对象上,次生口语时代以电子虚拟空间为平台,可以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等多元化互动,从而超越前两个阶段的条件限制;在话语权利上,次生口语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人人皆有话语权、人人都有发声机会的“话语平权”时代;在情感表达上,次生口语时代与文字印刷时代的理性和深沉风格迥异,它既充分彰显参与者的感性与奔放,又确保证理性话语从未缺席。伴随着个体进入电子化生存方式的次生口语时代的来临,文字印刷时代那种政府与社会沟通方式显得过时,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变得迫切。这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建构,比如:如何调整好政府自身的定位,使自身以更加亲民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大众的面前;如何改变传统的宣传模式,建立起与电子化时代高度离散和即时性特征相适应的社会互动方式;如何在众声喧哗中传递和塑造主旋律,在润物细无声中引领社会的话语导向等。

中国国家建构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话题,但必须以动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话题,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国家建构主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国家建构是一个恒久和常新的话题。时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都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大变局给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既要求对既往国家建构的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又能在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和增添新的国家建构内容。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稳立潮头,引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